



是歌声，是号角

张珊珊

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抗战期间，无数普通中国人誓死不做亡国奴，自发反抗侵略者。本期“寻访”栏目讲述的两个故事，正展现了烽火岁月里民族最危难时刻，普通中国民众的团结一心、奋勇抗日、英勇不屈。时光流逝，那些动人的人和事已经远去，但精神永不消逝，也必将永远鼓舞着后来者！

——编者

的妹妹，也乖乖坐在家中，帮忙卷纱布。周小燕更是发挥所长加入武汉合唱团，担当起独唱和领唱的角色。

淬 火

1938年前后，武汉成为抗战歌咏的澎湃心脏。数百个歌咏团、宣传队如雨后春笋，出现在工厂、学校、街头。一首首经典歌曲诞生，传唱四方。作为当时崭露头角的歌唱新星，周小燕首唱了其中多部作品。而最打动她，最让世人铭刻的，莫过于刘雪庵从上海带来的《长城谣》。

这首歌原本是为电影《关山万里》创作的插曲。潘子农写下浸透血泪的歌词后，邀刘雪庵谱曲。刘雪庵捧读词稿，心潮难平。万里长城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，这阙歌必将化作文化抗战的利刃，让四万万同胞听见抗敌的号角。

在淞沪会战的炮火声中，刘雪庵为《长城谣》谱曲，指尖触到琴键时微微颤抖。琴键落下，第一缕音符如春风拂过故乡的原野。忽而旋律骤深，那是同袍在寒夜里的呜咽。紧接着，节奏如战鼓擂响，“打回去”的怒吼从音符中迸出，四万万同胞以热血浇筑新的长城！

后来电影拍摄夭折，刘雪庵将词曲发表在自费创办的《战歌周刊》上，找到学妹周小燕演唱这首歌。

首唱成功，周小燕更加坚信歌声的力量，更积极地投身抗日歌咏运动。这时，一件让她痛彻心扉的事发生了。

一天，弟弟周德佑不辞而别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拓荒剧团”，赴鄂北作抗日宣传。匆忙中，他给父母留下一封家书：“父母养育之恩，将来在报国的时候，一起偿付吧！”……在这个时代，并不需要聪明，却很需要勇敢，我曾怨我自己没有勇敢，现在既有了勇敢，我宁可做傻子。”

在剧团，周德佑身兼数职，白天宣传、演戏，深夜赶写剧本。超负荷的工作压垮了他的身体，周德佑为革命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。

周德佑的牺牲震动武汉各界。《新华日报》刊登追悼特辑，父亲周苍柏强忍悲痛写道：“我为国家损失了一个志士而难过，我要继续帮助德佑所参加的第七宣传队”，母亲董燕梁写道：“我要把你的爱来爱世界上一切无母爱的儿女，我要继续你的志愿，努力到底！”他们将丧子之痛化作支持抗战的坚定信念。

儿子牺牲后，周苍柏将为德佑准备的留学费用悉数捐给他生前所在的剧团。自此，德佑的战友们都成了周家的孩子，而这个家，也成了这群青年最温暖的避风港。周家父母将对儿子的爱，毫无保留地给予了整个革命大家庭。

周小燕的内心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。以前她怕唱破音，现在她只怕歌声不够响，她要替弟弟喊出他那份“勇敢”，要完成父母“继续你的志愿”的心愿，要让千千万万人听见民族的呐喊。

也正是这份沉甸甸的使命，让她真正领悟了歌唱。许多课堂上唱不好的歌，此刻却越唱越响亮。她终于懂得：真正的歌唱，从来不是取悦耳目的表演，而是将一个民族的深重苦难，从自己的胸膛中迸发出来。

潮 涌

《长城谣》传遍大江南北，它被选入动画短片《抗战歌辑》，成为电影《热血忠魂》插曲，还被灌制成唱片，成为抗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歌曲之一。歌声更洋洋过海，牵动海外侨胞的衷肠。

1938年底，武汉合唱团28名成员在夏之秋等人的率领下，赴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巡回演出。这些可敬可爱的青年远离家乡，只为唤醒侨胞的爱国心，争取侨胞对国内抗战的支持。

每当《长城谣》等救亡歌曲在礼堂、广场响起，台下侨胞的眼眶就红了。这些歌曲，或雄壮悲壮，或激昂慷慨，一句句、一声声，都似重锤敲在人心上。人们想起被践踏的故土、离散的亲人，救亡的念头愈发强烈。情绪激动时，不少人从口袋掏出钱来扔上台去，将手上的金戒指、金手镯摘下捐献。他们捐出的每一分钱，都将变成前线将士的枪弹、棉衣和药品，完成这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。

周小燕的家，也悄然成为抗战洪流中的一方坚实天地。周苍柏不仅捐款抗战，还和妻子董燕梁在家组织人员为前线将士缝制棉衣。董燕梁是武汉妇女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之一。周小燕随母亲奔波，眼见战士伤口溃烂，她颤抖着手换药，心也在发痛。就连她三个不到10岁

1939年8月的一天，马来西亚巴生

港口。赤道的阳光灼热地洒在海面上，一艘轮船的甲板成了临时舞台。60余名即将归国服务的南侨机工整齐就座，目光聚焦在舞台中心。

团长夏之秋站在钢琴旁，以一首《长城谣》拉开序幕。歌声如泣如诉，仿佛将远方的战火与故乡的呼唤都融入了旋律。紧接着，独唱、合唱交替进行，歌声在海天之间回荡。

夏之秋临时开办“音乐速成班”，亲自教机工们合唱《保家乡》，他一句句地教，机工们一句句地跟唱。这些平日里与机械打交道的汉子，竟然很快掌握了旋律。“同胞们，大家一条心，不退缩不分裂，齐心去打敌人！”嘹亮的合唱声响彻云霄。

这一刻，音乐似纽带，将游子的心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。他们捐出的财物，是砌入长城的砖石，他们报国的决心，是长城不倒的根基。歌声所至，一座跨越山海的精神长城巍然屹立。

作为抗战期间唯一一个赴海外宣传抗日的音乐团体，合唱团南洋之行长达一年零四个月。他们的足迹遍及城市、海港和渔村，演唱200多场，210多万人次观看演出，筹得赈济款高达230万叻币，鼓舞众多青年加入回国服务的机工行列。其演出场次之多、曲目之广泛、效果之显著，都堪称奇迹。

武汉合唱团成立时曾在宣言书中表示，“我们唱一百个歌也不能直接地赶走一个东洋鬼”，但他们要用歌声“将大家隐潜着的热力”激发出来，“使每个人都可能奔上抗战的阵线”。他们做到了，用歌声吹响了战斗的号角。当陈昌雄们驾驶着满载物资的卡车驶入滇缅公路，当南洋募集的款项换成武器送往前线，那些在舞台上唱过的歌，早已化作千万人奔向战场的脚步声。

《长城谣》自此超越战火与年代，无论山河如何辽远，有华人处，便有《长城谣》的旋律。这首在民族最危难时刻诞生的歌曲，已成为熔铸于民族记忆中，一座用众声凝聚的“声音长城”，一座用众志铸就的“精神长城”。

长 歌

1995年，抗战胜利50周年，年逾古稀的周小燕站在长城之上。

山风拂动她花白的发丝，吹起黑底红花旗袍的衣袂。凝望群山之巅蜿蜒的巨大龙，她再次唱出那句刻在生命里的歌词：“万里长城万里长……”

歌声出口的刹那，时空仿佛重叠。她又变回那个20岁的武汉姑娘，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个民族的悲鸣与呐喊。山河依旧，却已换了人间，当年用歌声呼唤的新长城终于屹立不倒。而那些曾与她一同高歌、一同呐喊的人，许多都已长眠在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当“中国夜莺”的美誉传遍欧洲之时，在异国的舞台上，周小燕总是一袭旗袍，坚持演唱《长城谣》《红豆词》等中国歌曲。面对如潮的鲜花与掌声，她始终记得父亲的叮嘱：“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，学好了要回来。”1947年，她回到睽违9年之久的祖国。不是因为舞台在这里，而是根在这里。

“唱破这阴湿的天！”“从黑夜歌唱到黎明！”回国之后，周小燕举办多场义演，观众反响热烈，纷纷送上锦旗。是啊，这漫长的黑夜快要结束了，黎明就要到来。

1949年7月，周小燕参加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。会上，她听到最多的是“人民”二字。周小燕找到了此生的归宿：为人民歌唱。而从抗战时起，她走的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条路。

此后，她从闪耀的舞台走向朴素的讲台，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，将半生奉献给声乐教育和歌剧事业。“中国夜莺”叫得再响亮，也只属于个人，她更愿为祖国培养千百个“夜莺”。

1949年10月1日，周苍柏夫妇作为烈士亲属，应邀参加开国大典。儿子德佑憧憬的新社会——他们替他看到了。

后来，周苍柏回到武汉，将经营多年的“海光农圃”捐赠给国家，这片美丽的园林，正是如今东湖风景区的前身。

走进海光农圃，一座三人青铜塑像静静矗立。周小燕和周德佑在父亲身旁，意气风发，似在赏东湖风光，又似在携手迎接一个崭新的时代。

2016年，周小燕逝世，享年99岁。《长城谣》的旋律，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回荡。每当歌声响起，我们就听见一个民族的不屈与崛起，它已化作永不消逝的精神号角，在一代代中国人心中奏响。

长城巍然，山河已无恙，谣曲永流传。

一进沙河沿镇，雨突然变大了。千万道雨丝裹挟着浓重的雾气，将天地缝合在一起。车在河东村南台子屯的一片玉米地头停了下来。这片被雨水浸泡的土地，正是当年著名的抗日队伍“戴家军”的出发之地。

雨稍小，“戴家军”的后人戴世忠放下手中的雨伞，站在小雨里，向我们描述这里曾经存在的一切。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额头，又从额头流到眼睛，再从眼睛流到脸颊，他不避也不擦，像一株老树在风雨中伫立。他一会儿指向左，一会儿指向右，一会儿指向眼前的现实，一会儿又指向遥远的过去——

那边的小山，叫戴家小山。从小山往北，千顷农田和数座村庄，过去都属于戴家的地盘。那片玉米地中间是戴家大院的旧址。戴家大院被日本人焚毁之后，院子四角上的炮台坍塌，留下了四大堆石头。

南山脚下是戴家的坟地，一部分是祖坟，一部分是几十名死难者合葬的“乱葬坟”。戴氏一族的成年男人，除了年过七旬的戴广禄老人，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。“乱葬坟”里埋着的，是那些因为姓戴而被日本人残暴杀害的百姓。多年来，总有村民去那里除杂草或放一束野花祭奠……

雨再一次突然而至。雨点敲打着玉米叶，在身后噼啪作响。那声音如嘚嘚的马蹄声，一声声敲得人惊心，也将思绪带入1931年的血雨腥风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天，吉林敦化陷落。一座往日安静的北方小城，瞬间变成了“鬼门关”。

沙河沿戴家坐拥400多垧土地，是当地首富，戴家大院东西长约200米、南北宽约100米，有房屋80多间。九一八事变前，日本人便多次以“合作”为借口，企图吞占戴家产业。屡遭戴家掌门人戴万龄拒绝后，又挑起事端敲诈戴家钱财。

戴万龄早有抗日之心，此刻，更是心明义绝：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与其坐受凌辱宰割，不如奋起反击。得知“拜把子”兄弟——东北军旧部“老三营”营长王德林举旗抗日，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军（简称救国军），戴万龄便召集戴家所有男女老少和村中男丁，决定扛起枪炮，组建一支抗日队伍。

平日里，戴万龄就胸有侠义。他常年骑马抡枪，护卫乡里安宁。每遇灾荒之年，不仅主动减免田租，更常常开仓赈济，深得乡民拥戴。国难临头，他振臂一挥，众多血性男儿纷纷追随。

为了断绝后路，戴万龄心一横，变卖所有商铺、作坊，换作枪炮弹药，并一把火烧光全部地契、借据。

烈焰在戴家大院噼啪爆响，戴万龄挺立火前，目光如炬：“戴家祖孙四代57口，今日断门抗日，小日本不灭，死不归家！”是夜，熊熊火光中，戴万龄带领戴氏一族及本村青壮年共300余人，依靠30架马爬犁、10挺机枪，组成一支史上鲜见的家族抗日队伍“戴家军”，走上了举家抗日的道路。

“戴家军”随救国军转战于吉林、黑龙江东部地区，参加了镜泊湖连环战和攻打敦化、额穆、安图、东宁等战斗，多次重创日伪军。

戴家子弟虽英勇，但终归是民间武装，应对装备精锐、训练有素的日本正规军，其战斗难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。每一场战斗，戴家子弟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至亲倒在敌人的枪口下。国仇浸满了家恨，让戴家子弟更加视死如归。父亲倒下了，儿子上；兄长倒下了，弟弟接着上；家里的男丁打没了，还有女人和老人，也要上。

武器落后，戴万龄就把不到400人的“戴营”分成3个连，每个连下设3个班，每个班再分成3个战斗小组。战斗小组枪法准、跑得快、易分散，常常迂回到敌人后方突袭敌人的机枪手和拿指挥刀的军官。

很快，“戴家军”能打又不怕死的威名便传开来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

劲旅，以至于日本人一提起“戴”姓，便恨之切齿。他们心里清楚，如果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戴家一样，举家抗日，妇孺皆兵，中国不但不会再有那么多伪军和汉奸，恐怕他们连插足之地都找不到。

为了将戴氏一族斩草除根，更断掉中国人全民抗日的念想，日军焚烧了戴家大院，将戴万龄的堂弟戴万生用硬木橛子钉穿掌心，吊在城墙示众，他们还残忍地将所有戴姓者全部抓来，用刺刀一刀一刀开膛破肚。

战场上，日军“围剿”的网越收越紧，不仅增加了兵力，更增加了飞机、大炮。1933年，救国军寡不敌众，又孤立无援。为了保存革命火种，王德林决定带领伤病员退至苏联，并劝说“戴家军”一并撤退。戴万龄断然拒绝：“我戴家活着做中国人，死了做中国鬼！绝不做异乡鬼！”

为了冲破敌人的“围剿”，戴万龄决定带领子弟兵向汪清罗子沟一带突袭。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，当“戴家军”终于与救国军柴世荣部会合时，再清点人数，牺牲100多人，负伤100多人，损失惨重。1935年2月，“戴家军”加入周保中任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，次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成立，“戴家军”从此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道路，在周保中直接领导下继续战斗。到1936年初，已不足百人。

1937年之后，抗联第五军的处境异常艰难，战事更加吃紧，衣服、粮食补给严重不足。戴万龄奉周保中的命令，先后分5批派出8名子弟潜回家乡筹集粮食，结果统统落入敌人布下的罗网。

1937年深秋，为解部队燃眉之急，戴万龄不得不挺身涉险，带着三儿子戴克吉等人潜回沙河沿筹粮。戴万龄不幸被捕。戴克吉营救父亲失败，与十几名战士当场牺牲。

日军用尽酷刑，逼问戴万龄抗联队伍去向，戴万龄要么闭口不言，要么破口大骂，最后被日军用两块钢板夹在中间，泼上汽油，点火焚烧，奄奄一息时，又被扔进了狼狗圈。

还没等到抗战胜利，戴家投身革命的第二代“万”字辈12人，全部牺牲，第三代“克”字辈20人，也全部牺牲，还不是孩子的第四代“友”字辈也牺牲了11人。戴家，只剩下了70多岁的戴广禄和几位女眷以及戴万龄孙子辈的几个孤儿。

戴家，一门殉国！戴家大院的80多间青瓦屋檐下再无炊烟。

然而，戴家的枪，还在响。血海深仇像烈火一样在戴家女眷的身体里燃烧。没了丈夫的媳妇，死了儿子的老娘，继续上马、持枪，在雪窝子里与日寇死战。

“戴家，不能绝后啊！”周保中含泪下达了“保住戴家血脉”的命令。

是啊，戴家的男人几乎打没了。戴万龄一脉仅剩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。这些幼小的生命，能活到后来不知躲过了多少劫难。比如戴世忠的父亲。

1995年，戴克政牺牲57年之后，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。2022年11月，吉林省人民政府又追认戴万龄、戴万春、戴万珠、戴万发、戴克俭、戴克吉、戴克志7人为烈士。在吉林省敦化烈士陵园“革命烈士榜”上增刻了7人的名字。

作为英雄家族重要传承人的戴世忠，今年65岁，面部轮廓及神态酷似画像上的戴万龄。面对戴世忠，我竟一时恍惚，甚至感觉这就是那个活着的戴万龄。我想，这种酷似既有基因因素，也来自精神性的血脉。

2025年9月3日，戴世忠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。

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个英雄的抗日家族。

亲戴友喜，就是寇氏在千难万险中几乎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下来的。

当初，日军的“围剿”与经济封锁交织成一张不断收紧的死亡之网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戴万龄的小孙子戴友喜出生了。不幸的是，孩子落地没多久，母亲就死了。

那天，日军已经连续“清剿”多日，近百名弟兄在大雪里静静地埋伏着。突然，雪地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。虽然这哭声瞬间就被捂住，但戴万龄还是惊出一身冷汗。他一狠心，掏出枪，想结束这个小生命。

“爹，这是克政唯一的孩子，他还在前边拼命，咱不能让他绝后啊……”寇氏突然扑上来，用身子裹住孩子。寇氏是戴万龄二儿子戴克俭的媳妇，持双枪，善骑马，深受戴万龄器重。“留下这孩子吧！我保证，绝不让他哭一声！”寇氏含泪祈求。

从那天起，寇氏把不足一岁的戴友喜塞进宽大的棉裤裆里，用绳子在大腿根捆得紧紧的。白天跟着队伍走，孩子就在裤裆里头拉尿，晚上把孩子哄睡了，自己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清理……这才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保住了戴友喜。

戴世忠的父亲戴克政是戴万龄最小的儿子，16岁随父参加救国军，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牺牲时年仅23岁。戴友喜是他唯一的血脉。为了保住戴友喜，寇氏自己的儿子因为疏于照顾，不到10岁就没了。埋葬儿子那天，寇氏把脸贴在孩子的小脸上，喃喃地说：“儿子，对不住，你弟弟是你小叔唯一的根，得活着……”

1938年秋天，70岁的戴广禄和高氏、寇氏，带着四男一女五个孤儿，靠采集山上的榛子和蘑菇充饥，顺着山路，行走3个月之久，辗转来到寇氏的娘家沙河沿寇家屯。我们赶到寇家屯时，这里已是“长乐村长乐组”。当时收留戴氏孤儿的